

趙樹理研究資料

(內部參考書)

中條山有色金属公司七、二一大學語文專業一九七八級師生編

一九七九年三月、

赵树理研究资料

(内部参考书)

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七、二一大学语文专业

一九七九年二月

目 录

赵树理同志的作品与生平

附：赵树理同志作品目录（史纪言）	219
赵树理著作年表（山东师院中文系）.....	242

沁水县尉迟大队座谈会记录.....	138
访张万一同志谈话记录.....	141
访石岩同志谈话记录.....	142
访王中青同志谈话记录.....	144
访问晋城剧团谈话记录.....	149
访问晋城县文化馆祁重生同志谈话记录.....	151
访问栗守田同志的谈话记录.....	154
平顺县西沟公社川底大队座谈会记录.....	157
访问赵广建同志谈话记录（一）.....	167
访问赵广建同志谈话记录（二）.....	173
访问赵广建同志谈话记录（三）.....	177
访问崔庭壁同志的谈话记录.....	178
访问原南村峪口大队党支部书记尚贵生同志的 谈话纪要.....	180
访问原峪口文化室主任尚达运谈话记录.....	182
访问沁水县文化局干事田安法同志的记录.....	189

论赵树理的创作(周扬) 6 7

文艺随笔(史纪言) 6 6

向赵树理方向迈进(陈荒煤) 8 7

赵树理怎样处理《小二黑结婚》的材料(董均伦) 1 0 7

介绍《李有才板话》(李大章) 1 0 0

人民文艺的杰出成果

——推荐《李有才板话》(冯牧) 1 0 3

太行人民的儿子

——忆赵树理同志(王中青) 7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回忆作家赵树理(王中青) 1 9

回忆我的父亲赵树理(赵广建) 1 2

赵树理怎样成为作家的(王春) 9 3

回忆赵树理伯伯 1 6 3

无私的怀念(田安法) 1 8 3

忆赵树理同志(马烽) 3

思念赵树理同志(孙谦) 2 3

继续向赵树理同志学习(韩文洲) 2 6

怀念作家赵树理(西戎) 5 8

关于赵树理(陈艾) 9 6

农民心目中的赵树理(田培植·贾福和) 1 3 8

忆念赵树理同志(陈登科)	213
悼爷爷(赵宇辉)	252
给女儿的信(赵树理)	34
新食堂里忆故人(赵树理)	30
与读者谈《三里湾》(赵树理)	37
下乡杂记(赵树理)	41
《三里湾》写作前后(赵树理)	45
也算经验(赵树理)	63
艺术与农村(赵树理)	82
秧歌剧本评选小结(赵树理·靳典謨)	112
和工人习作者谈写作(赵树理)	198
赵树理同志诗七首	210
著名作家赵树理骨灰安放仪式在京举行	1
后记	253

著名作家赵树理 骨灰安放仪式在京举行

胡耀邦等以及中共山西省委、省革委会送了花圈 谭震林、宋任穷、张平化、黄镇以及王克文等参加骨灰安放仪式 周扬主持仪式 刘白羽致悼词

新华社北京十月十八日电 我国著名作家赵树理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十七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赵树理同志遭受林彪、“四人邦”反动路线的残酷迫害，于一九七零年九月二十三日在山西太原不幸逝世。终年六十四岁。

中组部部长胡耀邦，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文化部副部长司徒慧敏、姚仲明，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全国文联副主席巴金等，送了花圈。送花圈的还有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革委，中共山西晋城县委、晋城县革委，中共山西沁水县委、沁水县革委等。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谭震林，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宋任穷，中宣部部长张平化，文化部部长黄镇、副部长刘复之、周巍峙、贺敬之、王阑西、林默涵，中共山西省委

书记王克文，全国文联副主席周扬、夏衍、傅钟，作协副主席刘白羽，以及山西省代表武光、汤、马烽、刘江、孙谦、贾克等，参加了赵树理同志骨灰安放仪式。

赵树理同志骨灰安放仪式由周扬主持，刘白羽致悼词。

赵树理同志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积极从事文学创作和党的文艺工作。全国解放以后，赵树理同志历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一九六四年，赵树理同志回山西工作，为便于进一步深入生活，曾兼任中共晋城县委副书记。赵树理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八大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大会的代表。

赵树理同志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他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深入火热的斗争生活，先后创作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优秀小说。建国以后，赵树理同志又创作了《登记》、《三里湾》、《灵泉洞》、《套不住的手》、《锻炼、锻炼》等作品，还写了一些剧本和文艺理论文章。

赵树理同志一生为工农兵而创作。他经常深入农村，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他的作品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赵树理同志在发扬文艺的民族传统、

文艺的大众化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林彪、“四人邦”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疯狂迫害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时候，赵树理同志被打成“黑作家”、“黑标兵”，被迫害致死。

参加赵树理同志骨灰安放仪式的还有首都文艺界知名人士和赵树理同志的生前友好成仿吾、张光年、谢冰心、曹禺、李伯钊、姚雪垠、臧克家、吴作人、林林、蔡若虹、李庄、李普等。赵树理同志家属也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九日《山西日报》

忆赵树理同志

马　　烽

赵树理同志逝世的时候，我还在乡下“学习班”里劳动。也就是说还没有获得“解放”，还没有通信和探亲的自由。这一噩耗也是过了好久以后，由同情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悄悄透露给我的。我听了，当然感到十分悲痛，十分惋惜。

赵树理同志是我所尊敬、所热爱的作家之一。战争时期，我们虽然不在同一个根据地，但他的作品却是在那时候就读过了，而且不只读过一遍两遍。我从他的作品中得

到不少教益，也受到很大的启示。我最佩服的就是他笔下的人物是那样的活灵活现，真可谓“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他的作品的主题，也正是当时根据地农村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反映。后来我读了一些介绍赵树理的文章，逐渐懂得了：他所以能够写出这样好的作品来，除了其他原因之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长期深入生活，熟悉农村中各种各样的人物。

我认识赵树理，是在全国解放初期，那时候我们都到了北京，虽然不在一个单位，但常常见面，工作上也有一些来往。那时北京市成立了一个业余的“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主要任务是团结一些过去写章回小说的作者以及曲艺界的朋友们，共同学习，共同提高。“研究会”还创办了一个叫《说说唱唱》的通俗刊物。主编是老舍，赵树理是副主编，我是编委之一。当时至少每个月要开一次编委会，检查上一期的刊物，研究下一期的发稿计划。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一九五〇年夏天，正是大力宣传婚姻法的时候，刊物急需要发表反映这一题材的作品，但编辑部却没有这方面的稿子。编委会决定自己动手写。谁写呢？推来推去，最后这一任务就落到了老赵头上。这是命题作文章，也叫做“赶任务”。一般的说来是“赶”不出什么好作品来的。老赵却很快“赶”出了一篇评书体的短篇小说《登记》。这篇小说曾轰动一时，很快被改编为戏曲，改名为《罗汉钱》，搬上了戏剧舞台。他在这篇作品中，不仅揭露了封建婚姻的罪恶，歌颂了自由婚姻的美

满，更重要的是塑造了小飞蛾、张木匠、艾艾、小晚、燕燕等一些栩栩如生的人物。我当时曾这样想过：如果这任务落在我的头上，即使给我半年时间专门去搜集材料，也不可能写出这样动人的作品来。老赵为什么能够在短时间内“赶”出《登记》来呢？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他生活基础雄厚。脑子里早就形成了那些呼之即出的人物。就连那些“罗汉钱”、张木匠用锯梁打老婆之类的细节，也不是临时去“搜集材料”所能搜集起来的，而是作者长期深入农村生活的积累。

赵树理在一些谈创作经验的短文里，或是在和青年作者的谈话中，总是一再强调深入生活的重要性。而首先他自己就是身体力行毛主席指示“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楷模。过去在根据地的情况就不要说了。就是全国解放以后，他虽然由于工作的需要到了大城市，但他仍然是念念不忘他所熟悉的太行山区农村，每年总要挤出一定的时间到乡下去。不是参观，不是作客，而是一—照他的说法叫做和农民“共事”。也就是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去改变农村的面貌。

我没有和赵树理同志一块下过乡。一九七一年我获得“解放”后，曾在他蹲过点的一个村庄附近的另一个村庄插过二年队。他蹲过点的那个村子我也去过。提起赵树理来，大人小孩都熟悉。他们告诉我：老赵在这里蹲点的时候，正是大办农业社的那阵子，他不仅参予办社的大事，连改革农具，修补房屋，调解家务纠纷等等他都参予，而

且是认真地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吃饭时候，他常常是端着饭碗在饭场上和农民们聊天，也常常和喜爱文娱活动的人们一块唱上党梆子。谁都不把他当作家看待，而是看做他们当中的一员。从这里也可看出老赵深入生活的一个轮廓。甚至有人指给我看那里是“旗杆院”，那里是“刀把地”，那个人是“王玉生”——这些都是中篇小说《三里湾》中的地名、人名。我知道老赵的这部作品，并不是某一个村的村史，但从这里也可看出他的作品是以现实生活做依据的。他的作品，不仅过去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爱，就在他被打成“黑作家”、“中间人物”祖师爷，受到“严厉批判”的时候，他的那些被称之为“毒草”的作品，照样在群众中偷偷流传着。可见林彪、“四人邦”妄图要打倒一个真正的作家，也是不容易的。

文化大革命前二年，老赵为了深入生活方便，干脆把家搬回了山西，从事农村的实际工作，他在好几个县里担任过具体职务。后来他被“揪出来”的时候，正是在晋城县委担任副书记。

赵树理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他留给我们的除了驰名中外的那些作品之外，还有最重要的一条经验：这就是长期深入生活。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五日《光明日报》

太行人民的儿子

——忆赵树理同志

王中青

在我面前，摊开着几本书，我仿佛嗅到那里面有一阵阵浓郁的泥土气息，万宝全、玉生、李有才、小芹……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向我走来。他们的音容笑貌不离左右。而创造了他们，赋予他们生命的人——作家赵树理同志，却早已离开了我们。我对他是多么的惋惜和深切的怀念——这是我国文坛上多么大的一个损失呵！感谢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给他昭雪平反。熟悉他、喜爱他的作品、热爱他书中那些人物的人，都为此感到高兴，我也不禁想起了赵树理同志。

我曾遇到过不少仅仅为了写作而去体验生活的人，但没有看见他们写出什么作品来；而赵树理同志却是长期生活在农民中。

他的家在沁水农村，父亲是个干农活的全把式，扶犁耕地，摇耧下种，谁家农具坏了，他拉起大锯，支起铁匠炉，铁木工活全能拉开套；就是邻居们锅漏了、壶烂了，他也能给拾掇拾掇。从小跟上这么个“万宝全”，赵树理自然也练成了个小“万宝全”。他不但学会了他爹这全付

本领，而且深深地热爱这种生活，热爱他从小生活于其中的这些生活朴素、忠厚老实的人。当他一条扁担挑上简单的行李，来到城市读书的时候，他血管里奔流的仍然是从那块沃土里吸取的养料。一九三〇年前后，在党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的影响下，他开始了文学创作，而发表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铁牛的复职》，就是写农民的。就连他用的笔名“野小”，都没有失去他的本色：他说他爹是“野大”——大农民，他自己呢，就是个小农民了！此后，“左联”和鲁迅先生对他的影响越来越深，他歌颂农民、反映农民的斗争和生活也就愈加自觉。一九三二——一九三六年间，他在太原某小报付刊上发表过很多作品，不是用短篇小说来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唤醒工农起来革命，就是用文艺评论来大声疾呼地提倡文艺创作的大众化。

当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光辉，给文学艺术家们照亮了一条金光大道的时候，赵树理欣然踏上了这条道路。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他走遍了太行山两侧，先后任过《黄河日报》、《新华日报》、新华书店的编辑，随后他就专职搞写作。可是，他哪里象个作家呵！熟悉他的人都说，赵树理有两个特点：一是不讲究吃穿，二是好管闲事。这话不假，当我于一九四六年在武安县冶陶村迁到他的时候，他头上戴顶小毡帽，身上穿领布棉袍，斜挎的一个七歪八不正的挎包上，拴着条用成灰黑色的毛巾。就这样，他一头扎进农民中间，到处能听到他谈

话的话语，到处便腾起了欢乐的笑声。开春以后，遍地的耕牛走动了，他常常掖起棉袍，一手抓住犁杖，一手扬起鞭子，看着脚下翻滚的土壤，闻着泥土诱人的芳香，扬声唱起了梆子戏。秋天，金色的场上，珍珠似的谷粒扬到空中，又沙沙地落在金山上。扬场的人群中照样能听到他那略带沙哑的上党梆子声。他哪里象个文人、作家，他就是一个农民的心灵、农民的形象呵！我们在武安县赵庄搞土改的那年，他家就扎在这个村里。常常有这种情况，我们正吃着晋东南风味的饭——和子饭，有人来叫了：“老赵，快点快点！又打起来了！”老赵碗筷一丢抬身跑出去——嗨，原来东邻的兄弟俩又打架了，要不就是西舍的婆媳俩不和了。老婆婆、小媳妇们“老赵”长、“老赵”短地向他诉说着，老赵认真地排解着，直到一场风波平息。有时，在外当八路军的孩子们捎回信来，老婆婆们攥着信，颤巍巍地来找老赵，于是，老赵用他那娓娓动听的声音，给慈母念着儿女们的家书，共享着欢乐和忧愁；他也用他那创作文艺作品的笔，把老妈妈絮絮叨叨、缠缠绵绵的叮嘱寄到远方的孩子们身边。村干部们把他当成他们中间的一员，商议工作、起草文件、计算账目——事事都少不了老赵。在他那清脆的算盘子的噼叭声中，在村干部们烟锅子冒出来的浓浓烟雾中，村里群众发动的情况、土改进展的速度、群众的要求……就都装进了他的心里；一个个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也就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中。村里的年轻人也把他当成他们中间的一员，吃罢晚饭，他把碗

一扣，用筷子敲着这“鼓”，就唱起上党梆子，于是，小伙子、大姑娘闻声而来，挤满一屋子。唱到高兴处，他把棉袍一撩，说不定就来段“起霸”，引得人们又是鼓掌，又是叫好。要不就说快板、编顺口溜，他肚子里有用不尽的材料，“出口成章，非常得劲”——党的政策、前线的战果、土改的成绩、好人好事和坏人坏事——都是群众心里想的、喜爱听的，人们围着他，真象数九天围着一盆火。

根子扎得深的禾苗，肯定能长出好庄稼。赵树理的作品丰收了：《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写起来手顺，念起来口顺，那里面的不少人物，引得村里的人发出哄笑：“嘿嘿，看这象你不象！”

“瞎说！活脱脱就是你！”

群众多么喜爱这些作品呵，《小二黑结婚》的戏，演到哪儿，哪儿人挤得满满的。有一次，快开戏了，戏场门口站岗的儿童团拦住一个人，说甚也不让他进场。他解释：“我就是写这个戏的。”儿童团看看他那一身穿戴，直摇头。争论声惊动了后台，待剧团的负责人赶来，“呵，这是我们的赵老师呀！”把儿童团好一顿埋怨。叫他“赵老师”，不是没来由的，他不但编剧，还导演，连如何配乐、如何演奏他都管。剧团里上上下下都把他当成个可敬可爱的老师，而看了戏的老乡们都喜爱这个编戏的老赵，一散了戏，你也拉，他也叫，争先恐后地请他回家吃烙饼。

他陶醉于这样的生活，可有的人不理解他。一九四六年，美国作家贝尔登曾慕名而来，到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所在地拜访他。这位美国作家惊异他的作品销行内外、名扬欧亚，便问：“你的书销行这样广，得到的稿费和版税一定非常多。”赵树理说：“不，我并不计报酬，我们实行的是供给制。”这使贝尔登大大地激动了：“嘿，他们剥削了你！~~如果在我们美国，你早就成了富翁！”~~赵树理笑了：“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要求作家的标准便不同——写作，这就是我为党的事业工作、为工农群众服务的战斗岗位！”贝尔登眼睛睁得大大地——是的，他怎么能理解中国的革命文艺家所选择的这条道路呢！

就是在全国解放之后，赵树理住进了城市，也仍然坚定不移地走着这条路。有一年，我在北京马家庙胡同他的新居里见到他，招待我的，仍然是晋东南风味的饭食——拉面、和子饭。闲谈中，问起他的住房。我记得先前一所房子要比这套好得多，价钱也高几倍，便问他为什么搬到这里，他说是为了工作方便，至于价钱么，他说得最精辟：“钱这东西，是‘人民币’，来自人民，还给人民，我是从来不计较其多少的。”我又问起他的新作《三里湾》印了多少册，收入一定不小。他说：“我要是为了收入多，就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了，现在送到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是为了销行广，只要广大农民能看到这本书，我是不顾及稿费多少的！”

这几句话正说明了赵树理的为人。他把一生心血凝成